

評述《勞動在當代資本主義：下一章？》
與「消費工作」*

馮建三**

書 名：*Labour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What Next?*

作 者：Ursula Huws

出版日期：2019 年

出 版 社：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投稿日期：2020 年 8 月 20 日；通過日期：2020 年 11 月 17 日。

* 本文源自科技部（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04-185-MY2）的研究案。

** 馮建三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e-mail: jsfeng@ncc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馮建三（2021）。〈評述《勞動在當代資本主義：下一章？》與「消費工作」〉，
《新聞學研究》，上網日期：_年_月_日。DOI: 10.30386/MCR.202105.0011

《勞動在當代資本主義：下一章？》（*Labour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What Next?*）是胡斯（Huws, 2019）教授本世紀勞動三書的最近一本。前兩本，分別是 2003 年的《高科技無產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Huws, 2003 / 任海龍譯，2011），以及 2014 年的書，副標題為《高科技無產階級的成年》（*The Cybertariat Comes of Age*），主標題是《勞動在全球數位經濟》（*Labor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Huws, 2014）。

三本書的關鍵詞相同：資本主義、性別、勞動及其類型、全球化、（新）傳播科技（至現在的手機、寬頻與社交傳媒及自媒體）。不同的是，前兩本書是相關論文潤飾修整後的結集，第三本的內容雖然並非全新，但章節結構井然有序，顯見是為成書而有更大規模地重新書寫與安排，讀者從書名與第一章（導論）的鋪陳，就已看到作者的用心。

這篇文章有兩個部分，既是書介，也特意討論一個重要概念。首先簡介新作，並略補充；其次，貫穿三本書的「消費工作」（*consumption work*）這個概念，既使作者藉以修正「生產勞動」（*productive labour*）與「無生產勞動」（*unproductive labour*），也讓她對傳播領域討論已有四十餘年的「閱聽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能有啟發，本文提請讀者注意這個貢獻。

萬變不離其宗

《勞動在當代資本主義：下一章？》的第一章，可說是「必也正名」。胡斯注意到，對於當下世界，應該怎麼理解從而命名，從 1960、70 年代起的「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至前幾十年前的「公民電子人／賽伯人」、「數位游牧」，再到晚近的「分享經濟」、

「零時 / 即時經濟」等等，可說是五花八門（總計，作者列出了 48 個名詞）。她說，每一次，新名詞的出現都讓人覺得，現存的詞彙不再能夠有效描述業已改變的狀態，現有的制度再沒有能力適應，甚至「勞工階級的終結」、「沒有異化的創意勞動」等修辭，都曾經風光登場。但是，她更願意強調的是，萬變不離其宗，歌手 Bon Jovi（邦喬飛）在 2010 年唱出的歌，「事情改變愈多，愈是相同」（Huws, 2019, p. 8）就是這個意思。人們若是沒有自我提醒，很容易就會因為新術語而分神，思路可能為此紊亂不清晰，妨礙行動方案的研擬。

什麼改變了？什麼又是其宗？本書分次敘述，談「變」三章，說「宗」兩章。

說「宗」兩章

先談「宗」，其一是資本主義的擴張與積累，純屬本能，是為了擴張而擴張，並無倫理價值作為依歸，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第三章）。由於擴張本身（經濟成長）就是目的，為此而生的矛盾，成為必然存在的衍生現象。因此，有人富可敵國，更多的人同時貧無立錐之地。富國的誇張者是美利堅，其軍事支出領先各國，歐中俄日等五十餘國相加仍然瞠乎其後，¹ 但美國的貧窮陷阱（poverty gap）比例，數一數二。² 世界暖化、地球增溫是「緊急狀態」，³ 不只是另一個問

¹ 美國 2018 國防支出占 GDP 3%，遠超過 OECD 平均的 2.1%（見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GD.ZS>），金額 6488 億美元，超過中國（2499）、歐洲 50 國（1984）、沙烏地阿拉伯（676）、俄國（613）與日本（466）總和的 6234 億美元（見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CD>）。

² 以家戶收入低於中位數之半為準，美國是 38.8%，歐洲僅義大利 40.4% 較高，德國是 25.1%，法國是 25.3%（見 <https://data.oecd.org/inequality/poverty-gap.htm>）。

題，但下焉者不承認是人類活動造成；中焉者停留在以綠能開發作為解方；極端則寄望於進軍太空；富裕人及富裕國的減量消費，尚未進入主流視域，雖然「去增長」（degrowth）運動與論述漸增。⁴ 不過，作者提醒讀者，這個體制的演變，充斥各種衝突，並不一帆風順，各型資本之間、勞資之間與勞勞之間，以及政府與勞資之間等等，各行動者或組織，都是既聯合又摩擦。然而，體制的行進主軸，仍然是「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胡斯通過「全球價值鏈、價值的創造與實現與商品化」三組概念的討論（Huws, 2019, pp. 35-44），展示雖有多種激烈的競爭，但集團企業愈來愈大，反過來又阻礙了競爭，收入分配為此更不平等，包括勞動者的工資占「國民生產毛額」（GDP）的比例下降，如美國在 1970 年是 63.47%，但 2015 年是 57.65%（法國這兩個年度是 69.10% 與 61.17%）。⁵

「宗」之二，是第四章的焦點，「資本主義之下，工人組織的矛盾力量」。這就是說，工人固然會自我組織，試圖改善工作條件，但個別的工人怎麼結合成為工會？哪些人納入，排除哪些人？勞心勞力的差

³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有 1 萬 3 千多來自 156 國的科學家連署〈世界科學家的氣候緊急警示〉文件（見 <https://scientistswarning.forestry.oregonstate.edu/>）。

⁴ 有關「去增長」運動的歷史與辯論，見 Borowy & Schmelzer（2017）；最近的一本專著是 Hickel（2020）。

⁵ 見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pdtyv-2017-en/index.html?itemId=/content/publication/pdtyv-2017-en>。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曾說，1990 至 2016 年，臺灣人的工資所得占 GDP 的比例，減少了 7%（沈婉玉，2017 年 12 月 22 日）。這個數字的實際意義是：若 2016 年的工資與 1990 年相當，該年臺灣 890.6 萬就業人口的人均年薪，會增加 21.5146 萬，當年年薪會從 44 萬多「躍升」至 66 萬左右！如果不是勞方全拿，是勞資均分，那麼，受薪階級一人的前年所得，會是 55 萬多。（臺灣 2016 年 GDP 是 5320 億美元，見 <https://www.focus-economics.com/countries/taiwan>，一美元以 30 臺幣計。）

異、高低技能的分野、公司與職業工會的不同、對各種議題的立場（比如，是否在哪些條件下引進自動化、是否贊同基本所得政策及其額度高低、是否以及接受何種環保與減碳標準的水平等等），以及「產業後備軍」（女工、童工、待業者、失業者、移民工……）的存在，都是影響工人組織的規模，及其能否採取協同立場與行動的局部原因。胡斯認同 E. P. Thompson（湯普森）的歷史分析及信念，認為既然歷經工業革命後，「十九世紀的勞工階級，已經不同於十八世紀的烏合之眾」（Huws, 2019, p. 56），那麼，當代活生生的人、勞動者不肯行屍走肉、不願逆來順受而會尋求改善，應該也是必然的道理。胡斯說，本世紀初，世人大致擁抱資本全球化與「自由」貿易，2008 年金融危機後，批判這種全球化日漸增多，也刺激人們再對工會重啟興趣，激進而勇於採取工業行動的頻次也逐漸增加，即便各級工會之間還沒有協議要怎麼團結，「但跡象鼓舞人，這可能已經近在眼前」（同上引，p. 78）。胡斯從歷史也從當前世界的勞資動態關係，不斷確認勞動者既是受害者，也是希望的泉源。

這個人生觀或世界觀，認定工會必然也會持續歷經組織、解體而後再組織的過程，同樣也在本書最後一章展現無疑：2018 年最後一日，31 個國家的快送員在罷工與採取其他工業行動後，在布魯塞爾成立跨國工會；顯然「若有工人消極接受……沉淪成為不再具有差異的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的結論，那就錯了。……很多獨特的職業認同仍在，也有新的抵抗與組織形式，同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Huws, 2019, pp. 159-160）。⁶

⁶ 胡斯並沒有僅只是寄望於工人及其組織，通過公共政策取回與推進工作者當有的福祉，作者另有本文完成時，尚未出版但已宣告的新作（Huws, 2020）。

談「變」三章

自資本主義之「宗」而觀「變」，晚近的改變是「創意工作」（第五章）的甚囂塵上。人不是機器，必有心思，俗稱勞力之時，心亦相隨；家長的床邊講故事、工匠用力的分寸，迄至詩人吟誦與教授長篇議論等等，都有創造的成分。但作為流行的術語，「創意工作」起於英國上個世紀末開始倡議的「創意經濟」，其後流傳，至臺灣於 2002 年開始有「文化創意產業」之說。資本主義將愈來愈多的活動或工作，納入其航程，現在來到了「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神聖光環」褪色，「以知識為基礎的現代全球經濟體，（創意工作）站在高度矛盾的位置」（Huws, 2019, pp. 79-80）。比如，創意與想法變成資本的禁臠，共享不損其內涵的「智慧」，資本或是疏忽、或者「捉小放大」以收開放的形象，實則通過國家法權的強制，將其更重要的部分變成排他的「財產」。又如，資本體系若要不斷創新，就得讓人自由想像新的可能，並且要提供資源，協助其測試新的想法：「有創造力的勞動是火花，點燃引擎」（Huws, 2019, pp. 78-79），全球的知識經濟必須以此作為基礎。但是，發想與創念既已肆無忌憚，資本真能使其納入管理，服務而不忤逆資本？對於勞方來說，胡斯的提問是：

青年人進入這些創意工作，終究會面對這些矛盾，他們是會欣然從事、逆來順受，是會合作而加速商品化過程，因此必然帶來浪費與環境破壞，或者，他們會進入犬儒的半接受狀態，僅是消極抵抗，又或者，他們會將自己的能量與原生之力與理想主義移轉至其他領域，通過想像與規劃，對另類社會與經濟模式的宏圖，有所貢獻？（同上引，pp. 105-106）。

其次，以後見之明回顧，很多進步學人認為，⁷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末，是歐美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接近充分就業，並且，從醫療保健、育嬰與中小學到大學的教育，乃至住房，都已全部或局部「去商品化」，這些項目在英國（歐洲）是基本人權的成分，比商品性質濃厚不少。然而，1980 年代以來，這些公共服務項目再遭改變，從去商品又進入商品化的航道。新的政治力量，配合經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漸次解構了福利國家、私有化公營企業之外，政府開始以效率之名，將相關服務外包，但未必節省公帑，反而會是圖利資本，如研究顯示，公立醫院清潔或廢棄物處理外包，政府是節省了 1.24 億英鎊，但代價卻是 2.5 億英鎊的投入，外包之後，等於是國庫倒貼 1.26 億英鎊（Huws, 2019, pp. 110-111）。到了 1998 年起，英國成為歐洲唯一對就讀大學的本國人，收取學費的國家，先是一千英鎊，至 2010 年起，幾乎是一萬英鎊起跳。英國健保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 NHS）的商品成分固然仍低，但在「相同」的照料服務由公共提供轉至外包私人時，工作者的「利他動能」（好好照顧一位病患），與資本「極大化生產力」以符合「表現績效」的要求起了衝突，NHS 的組織文化也有了變化（同上引，pp. 117-119）。

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體制，是勞工運動及其他（包括來自國家機器内部的）進步力量，聯合迫使國家介入，重新分配由工作者所創造的價值，以普遍原則所推動的有限度去商品化。近三十多年來，這個僅屬差強人意的成果，竟已守成不易；與此相對，「家務工作的商品化」原本可以是女性（從而也可能是男性）經濟獨立與個性解放的契機，實則事與願違，原因有二。首先是雖然有愈來愈多的新器物（電鍋、縫紉機、洗衣機、洗碗機、吸塵器……），但原先多由女性承擔的家務活動，時

⁷ 最知名的人可能是皮凱提（Piketty, 2014, p. 98）。

間並沒有減少，如英國家戶平均每週在 1920 年代得從事 60 小時家務，到了 1970 年代是 70 小時！（Huws, 2003 / 任海龍譯，2011，頁 11）。在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結束之際，英國異性結婚的家庭，女性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一年比男性多 12 天，而美國青年世代認為，女性理當是家庭主婦的比例，是父執輩的兩倍（Howard, 2020）。再來就是在新商品進入家庭與個人生活之後，「無償的消費工作成長了」（Huws, 2019, p. 137），這就使得家庭變成勞動力與新商品的供需庫存地，人們的時間等於被偷走了（比如，通勤之時與朝九晚五之後，還得通過手機，與客戶或上司或同仁聯絡；消費者自己在網路下單，然後前往特定商家取貨），由於時間減少了：

家戶成員的家庭分工就有了更多的衝突，產生了更大的壓力要買新商品，並希望這些商品能省你一些時間，於是你就得多賺些錢來買商品，然後就是家戶時間承受更大壓擠。這就是說，資本主義鏈結的緊束，就是資本主義的增長（同上引，pp. 138-139）。

宜家（Ikea）在 2017 年購併 Taskrabbit 這家零工平臺，正是「消費工作」實質意義的一個證明。

「家務活動商品化」所涉及的「消費工作」，是個重要的概念，對於傳播研究來說，可能又格外值得注意。這是因為，起於 1977 年的「閱聽人商品論」，近年重新引發熱議與延伸，⁸ 動源是人們如今使用

⁸ 在原先的廣電領域，見 Meehan（2018）；延伸至數位年代後，見蕭肇君（2015）的書介，陳志賢（2017）更深廣的論述，以及姚建華、徐偲驢（2019）。更晚近的說法是，自動化、AI 與 IoT 已使個人資料及其彙整成為「未來的燃料、二十一世紀的石油、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資源」（The data economy: Fuel of the future, May 6, 2017），而人們在生活過程接觸或使用新舊傳媒所產生

固有傳媒（legacy media）的時間，特別是青年世代的人，愈來愈少於對手機、（平板）電腦、寬頻與社交傳媒所形成的「新媒體」之依賴，即便固有傳媒設定各種議題的（新聞）能力，依然重要也領先新媒體。

「消費工作」與勞動類型

然而，既「消費」，又「工作」，這不是矛盾嗎？不是。最早使用該詞的學者 Weinbaum & Bridges（1976）所要探討的是，職場的「工作」有酬勞，但返家之後，總有餐飲洗滌整潔……家務工作屬於非薪資工作，這些「消費」活動必需有人承擔，但這個部分卻沒有酬勞，後面這類就是「消費工作」，並且主要是由女性從事。那麼，職場的薪資工作與家務的消費工作，關係是些什麼？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女性緣此產生的政治意識，會是哪些面貌（同上引，pp. 88-89）。胡斯在三本書都深入援引並演繹這個概念，最早是在 1982 年（而社會科學界「正式」引用，已是 2015 年），⁹ 發為〈家務科技：解放者或奴役者？〉短文（Huws, 2003 / 任海龍譯，2011，第二章）。她強調，自己多次聽到帶有善意的男性進步學術工作者，若不是認定科技將可解放女性，使女性不再苦勞，就是認為家務勞動位於「消費領域」而「不值得

的資料是「勞動」的成果（Arrieta-Ibarra, Goff, Jiménez-Hernández, Lanier & Weyl, 2018）。不過，地球暖化、貧富及不平等擴大等重大問題，足以動盪社會，但其未能有效舒緩，不是資料不足，是政治意志與力量使然。

⁹ 這是在「消費工作與循環經濟」框架下的研究項目，但首先以此成書名的 Wheeler & Glucksmann（2015）雖然清楚界定這個概念：「消費工作是獨特的勞動形式，指涉購買、使用、再使用與處置消費財與服務所必需的勞動」（pp. 37, 47-50），但表示馬克思主義學者（未引述胡斯）與社會學取向對「消費工作」的研究，與他們不同。另見

<https://www.sci.manchester.ac.uk/research/projects/consumption-work/>

討論」。胡斯有一友人，是投入工會活動的女秘書，她的丈夫對她最後通牒：「選他，選工會」。女秘書「想了一下，然後做出了決定。我選工會，謝謝！」（同上引，頁 50）。

十多年後的兩本書，胡斯推進或說修正，「家務勞動」仍是她先前四類勞動分類（圖 1，B 類）以及後六類（圖 2，1 類）勞動的一種，「消費工作」則另有所指。在這過程，胡斯引述「正統」馬克思（Karl Marx）日多，但也有不盡相同之處；這個差異是後出轉精的來源，或是恣意挪用的結果，理當討論。

圖 1：四種勞動類型

	有酬勞動	無酬勞動
「再生產的勞動」： 為整體社會 / 資本主義	A 類勞動 公共行政與公共服務工作 （包括 NGOs）與個別化提 供的私人服務	B 類勞動 家務勞動：照顧幼兒家戶維 護等等，包括非市場化的文 化活動
直接「生產的勞動」： 為個別資本家企業	C 類勞動 商品生產，包括分配	D 類勞動 消費工作：「消費者未得酬 勞的勞動」，取代有酬勞服 務與發行分配的勞動

資料來源：Labor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The Cybertariat comes of age (p. 155), by U. Huws, 2014,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圖 2：六種勞動類型

	無酬	有酬	再生產勞動	生產勞動
1 再生產工作，超越資本主義的範疇：生計勞動 前資本主義的狩獵打魚農耕……維生勞動，至資本主義的家務勞動包括教幼童說話……。		○	○	
2 直接為個人或家戶執行服務工作：僕役勞動 這是資本家以其收入含利潤雇用，馬克思說，這是消耗而沒有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		○	○	
3 為私人服務公司工作：資本家服務工作 資本家創設的商鋪、餐廳、飯店、運輸、維安、清潔等公司與各級私立學校。		○		○
4 在公共機構或提供公共財的其他 NGO 工作：公共服務工作 提供基礎設施、警察維護社會治安與秩序……馬克思稱之為「無生產力」，而我偏好命名為「再生產的」勞動。		○	○	
5 在生產工業部門工作：資本家生產工作 在資本主義下，馬克思認為，直接與資本存在直接衝突關係的這類工作將持續增加。 (本文筆者按：這裡的「工業」部門，應該包括農林魚牧礦業與製造業)		○		○
6 消費財貨或服務涉及的外部化任務無酬為之： 消費工作 上網訂房購物、超商自行取物入車、ATM 提款等等。	○			並不直接有生產性—增加有酬工人的生產力但不直接生產剩餘價值

資料來源：Labour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What next? (pp. 29-32), by U. Huws, 2019, London: MacMillan.

根據表 1，胡斯提及或引述馬克思從 2003 年的 14 次，至 2019 年是 96 次，幾乎增加六倍。馬克思創始的概念「剩餘價值」也從 6 至 20 次，「利潤率下降」直到 2019 年方告使用，但僅 2 次。

表 1：胡斯二十一世紀勞動三書關鍵詞及其使用頻次
(含出現於索引的相關頁次)

	馬克思	消費工作	生產 勞動	無生產 勞動	再生產 勞動	剩餘價值	利潤率下降
	Marx	consumption work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reproductive labour			surplus valu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馬克思未使用的名詞	馬克思繼承古典政經學的名詞			馬克思創造的名詞	
2003	14	13	0	0	0	6	0
2014	79	9	4	4	11	24	0
2019	96	14	6	9	21	20	2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

生產、無生產與再生產：斯密與馬克思

「剩餘價值、利潤率下降」這兩個專屬馬克思的概念要能成立，又得先行確認，勞動確實可以分為「生產」與「無生產」。

這個區別脫胎自法國重農學派（認為價值來自從事於農業的勞動，不是貿易），經古典政治經濟學鼻祖 Adam Smith（斯密）轉用於物質產品的製造，此時，所有在農林魚牧礦工領域的人，都對不勞而獲的地主或貴族坐收地租非常不滿。他們認定，「價值」來自於勞動的投入，通過勞動時間長短與技術良窳的衡量，可以「客觀」決定其高低大小，這是「勞動價值論」。1870 年代以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界逐漸捨棄客觀的勞動價值論，改為擁抱「主觀效用論」，認為價格與價值同義，人們認定產品或服務帶來滿足，就會花錢購買，這是主觀之情，非客觀可說，因此：「珍珠賣得一個高價，並不是因為人潛水把珍珠撈上來的緣故；相反，人之所以潛水把珍珠撈上來，是因為珍珠可以賣得高

價」(Mills, 2003 / 高湘澤譯 2005, 頁 193-194)。¹⁰

馬克思繼承古典政經學，但他與斯密等人，又有兩個差異。第一，斯密從勞動「本身」區別何者「生產」，何者又「無生產」。斯密在《國富論》是這樣說的：

勞動有兩種，有一種是使其所加的對象增加價值的勞動，另一種則是無此結果的勞動……在社會最受尊敬的若干階級的勞動……不生產絲毫的價值……有些是極莊重、極重要的職業……牧師、法律家、醫生、各種文人……即使是最高尚、最有用的勞動，也絲毫並不生產日後可以購買或獲得同量勞動的物品。他們的工作，像演奏者的朗誦、演說家的雄辯、音樂家的曲調一樣……在其生產的瞬間即告消滅 (Smith, 1776/1970 / 周憲文譯, 1968, 頁 325-326)。

馬克思則說，斯密誤認了(使用)價值的內涵。馬克思從「生產關係」，亦即勞動者是否受僱於資本家，以及是否進入市場以其勞動產品交換貨幣，作為論斷生產與無生產勞動的依據。因此，他說，使用價值：

可以是物質產品，也可以是一種效果，是這些產品的某些部分滿足了人的欲求……至於這些欲求「來自腸胃口腹，或是當事人的幻想」是無關的……歌手將一首歌灌入空氣而產生了消費

¹⁰ Steedman (1995) 編有文集，提醒對立「客觀勞動價值論」與「主觀效用理論」並不符合思想史的實情。該書的論文顯示，從德奧瑞士、丹麥與瑞典及義大利和法國並荷蘭乃至俄國，固然都有邊際主義(心理效用論)與馬克思主義(客觀勞動價值論)的對立，但至少從 1870 年代至 1930 年代，都有學者強調，邊際分析與更為傳統的社會主義分析，可以互補而不是矛盾，甚至有人主張，社會主義者理當運用邊際分析，論證社會主義者主張的合理與正當。

的標的，或是這首歌錄製成為唱片並機械地複製而成為消費的標的，都是具有物質性的（Shaikh & Tonak, 1994, pp. 21-23）。

胡斯也兩次直接引述馬克思：

比如，John Milton（米爾頓）不是生產工人。與此相對，賣文為生的作家把劣等作品給了出版商，他就是生產工人。米爾頓寫《失樂園》，有如春蟬吐絲，是他自己的本質之表述。後來，他以五英鎊賣了作品，這樣他就成了商品的交易者……一位歌手快樂吟唱如同鳥兒，是無生產的工人……同樣一位歌手，若是與企業家打交道，為了賺錢就唱歌，她就是生產工人，她直接為資本而生產（Huws, 2014, p. 171, 2019, p. 26）。

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第二個差異，在於他認為，斯密等人未能看出，資本家的利潤（「剩餘價值」）來自無償占有「生產勞動」的部分價值；馬克思又主張，隨資本家引入機器置換人力，亦即以死去的勞動所沉澱的成果，替代唯一能夠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利潤）的活生生的人，則利潤率必然下降，資本主義的地理擴張與商品化的推廣，僅能延遲下降於一時，無法永遠，因此，遲速這個體制就要因為利潤率的下降而走向崩潰。這個源自勞動剩餘價值論的歷史命定說，即便在馬克思主義也不再是主流，最知名者，可能是市場社會主義者、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羅莫爾（Roemer, 1988 / 段忠橋、劉磊譯 2003，頁 190-193；另見頁 53-57）的看法；他說，「馬克思主義分析最薄弱」的部分，就是「勞動價值論」。¹¹ 胡斯提及利潤率下滑時，並未指這是資本主

¹¹ 這並非說剝削不存在，生產工具的有無、性別與組織科層位置及地域或國別乃至運氣……，都是產生剝削的可能原因。僅從雇用關係談剝削，除了是限縮之外，

義的終極歸宿；事實上，資本體制終將崩潰的說法，由來已久，但她不免認為，單這樣講，多少是狼來的故事，因此，與其談崩潰，不如體認勞工既是受害者，也是改造社會的希望，不偷懶、努力關注與研判勞工運動與組織起落在內的社會整體動態，相機行事，才是當有的認知（Huws, 2019, pp. 44, 46, 140-143）。

馬克思繼承斯密的客觀勞動價值論，然後代之以客觀勞動「剩餘」價值論；胡斯保留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觀，也使用「利潤率下降」，但放棄其歷史命定論，並引入「消費工作」這個概念。早先，她從 1970、80 年代起，用此分析無酬勞的「家務勞動」，其後，到了「資訊與傳播科技使得生產與消費的界線模糊」的本世紀（Huws, 2003 / 任海龍，2011，頁 117），「消費工作」這個概念延伸到了有酬及無酬的網路線上與線下的眾多勞動。

由於割捨了「無生產」勞動這個概念，在討論「消費工作」時，胡斯更常使用的概念是「再生產」勞動。如表 1 所示，在 2003 年的整本文集，胡斯都未連用「生產、無生產與再生產勞動」等術語，但已經頻繁支使「消費工作」一詞，這是資本主義擴張過程，誘發或迫使很多家務勞動「外部化」；比如，外食，無論是到路邊攤的小商品消費，或是到大資本餐飲集團的連鎖店消費，都是自行炊爨的取代。不僅家務勞動以外購商品取代，服務業面對勞動成本的「巨大壓力」；除此之外，

更麻煩地是，真要絕對客觀定義，然後計算勞動價值，進而核算人在勞動所付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一部分沒有從資本家那裡取得回報，也就是有這一段「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攫取，因此勞工被資本家剝削的說法或論證，無論是從「實證」或「規範」意義來說，都很困難而近乎不可能。羅莫爾主張，消除不公正的不平等，重要著力點或出發點，是要面對最初生產工具所有權分配及其繼承所造成的不平等，提出解方。另可參見許國賢（2001，特別是頁 195-205），以及周濂（2015）。

「消費工作」的增加，更是解方之一：

將勞動外化……用消費者的無償時間取代工人的有償時間……
鼓勵顧客儘量自己做事……得到顧客的歡迎……管理層……鼓
勵顧客盡可能自己做事。

很少有人……實證研究……公民在消費商品化服務時花費了多
少「休閒」時間……無償消費工作……泰勒化……的程度如
何……這些表面上能賜予人自由的資訊傳播技術擴大了……服
務……但……導致日常生活品質惡化的巨大危險（Huws, 2003
/ 任海龍譯，2011，頁 125-128）。

其後，胡斯的 2014 文集，蒐集出版於 2006 至 2013 年的著作，使
用「生產」與「無生產」勞動僅各四次，合計少於「再生產」三次。
2019 年，「生產」與「無生產」合計出現 15 次，「再生產」是 21
次。

「再生產」取代「無生產」：倫理問題

胡斯對「生產」一詞並無異議，但對「無生產」一詞比較審慎，傾
向於不用，而是代之以「再生產」。因此，她說：

分析者常見跟隨馬克思，區分了「生產」或「無生產」（剩餘
價值）。我在這些論文採納的洞見，來自女性主義，對此有略
微（slightly）不同的區分。這是整體來說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勞
動可以稱作是「再生產」，以及為個別資本家或資本集團直接

生產的勞動，在沒有更好的用詞下，我業已稱此為「直接生產」（directly productive, Huws, 2014, p. 154）。

各種警察與政府服務使得資本主義能夠平順運作，使得公共秩序得以維持……我偏向將這些形式的勞動稱為「再生產」而不是「無生產」……因為我（跟隨馬克思）堅持認定，（這類勞動的人）生產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但只要他們仍然在資本主義關係的直接範疇之外，他們並沒有生產剩餘價值（pp. 27-28，另見 pp. 31, 124-125, 128, 136）。

胡斯以「再生產」勞動取代（有酬或無酬的）「無生產」勞動，避免了似乎會隨後出現的「不事生產、沒有貢獻、寄生」的倫理印象或譴責，雖然這個用心合理，卻不能說二者僅「略微不同」。¹²生產者不但自食其力，且是社會價值的創造者，卻有部分為私人占有；無生產者

¹² 這是因為，生產者與無產者（胡斯代之以「再生產」者）的區分，不能說沒有倫理蘊含。比如，經濟危機由金融股市等「無生產」的行業引爆，生產業無端受害。另有馬克思主義學者（Shaikh & Tonak, 1994, pp. 4-5, 20-21）引用日本首相之語，指美國人投入太多資源在金融與律師行業，「高度沒有生產價值」，前書作者又引哈佛大學經濟教授孫莫斯（Lawrence Summers）的扼腕（「最常見的抱怨是……金融市場有那麼多才智之士投入票據資產的交換，偏就不是投入在真正地財富創造……」）；他們然後表明，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務、商品流通過程的廣告行銷與金融等等勞動屬於「無生產」的界定，完全與「倫理判斷」無關。然而，他們為主張自己的分析符合科學而做此聲稱，或胡斯為避免造成對於工作者的譴責而換詞，都會墜入主流經濟學不談倫理、從而不談好生活的窠臼。R. Skidelsky & E. Skidelsky (2012/李隆生、張又仁譯，2013) 破除「主觀心理效用論」與「客觀勞動（剩餘）價值論」的不當二分（參見註 9），「倫理判斷」是入門磚：GDP 計入或排除哪些活動的討論（Coyle, 2014 / 劉道捷譯，2015）；1960年代至今，許多國家陸續對煙草、酒品、糖品加徵一般消費稅以外的「罪惡稅」（如 Javadinasab, Masoudi Asl, Vosoogh-Moghaddam, & Najafi, 2019），是價值判斷的具體展現。

就其分工，仍有收入，但這些收入來自於對價值的消耗。荷蘭史學家布雷曼（Bregman, 2016, pp. 153-161）對比兩種罷工，從另一層面，具體表述其分野。1968年2月，紐約市七千清潔隊員罷工，市長兩日後宣布緊急狀態，第九天同意工會所請。1970年5月，愛爾蘭也有七千人罷工，他們都是銀行員；當時，專家認為該國經濟勢將因此停滯。半年後，愛爾蘭經濟不僅還在運作，並且成長強勁，銀行員落敗，罷工結束。布雷曼引伸而提問，若是各種社交傳媒顧問與員工、數位行銷人員、人均數量是日本17倍的美國精明幹練之律師、十萬個華府遊說人員，通通罷工，會有什麼光景？不知。但確認的是，當局不會如同紐約市長那般宣布緊急狀態並屈服。原因是「這些工作不是在創造財富，僅只是把財富搬來搬去」（同上引，p. 155）。

「生產」與「無生產」（胡斯稱之為「再生產」）的差異之外，另有兩點要注意。

其一，有些在消費領域的活動如胡斯所說，可以是消費「工作」，但不是所有在「消費」領域的活動都是「生產或再生產」工作；人類的「活動」遠大於資本主義的「勞動」。¹³

「消費」領域的活動不能算是「消費工作」的最明顯項目，就是在網路數位空間嬉戲玩耍、打電玩、從事影音圖文瀏覽或上傳下載或社交等活動。胡斯注意到，2010年社交媒體有9.7億用戶，2018達26.2億了；使用時間從2012年的一日90分鐘至2017年的135分鐘。怪異的是，如同是「工作」的異化，使用愈多的人，愈有孤獨／低自恃及沮喪

¹³ 人類的活動可二分為「非勞動」（又可分成分配產品與收入、個人消費與社會消費三種），以及「勞動」（商品的生產、流通及社會秩序的再生產三種）兩類。「勞動」當中，又有很多應該列入消耗價值的「無生產」（胡斯列為再生產），如公共行政、立法、司法及軍警等等維持社會秩序的勞動（Savran & Tonak, 1999）。

的感覺（Huws, 2019, pp. 152-153）。確實，是有論者因此說，諸如此類的活動雖然是「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ur），但卻是「沒有得到報酬的免費勞動」（free labour），構成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是這樣嗎？

胡斯說，為了自己的表意而在這些平臺以圖文影音說事，但不以此換取收入的行為，仍是使用價值的生產，即便其產品日後遭銷售或被偷竊而變成商品的基礎（Huws, 2014, pp. 171-172）。然而，這與「閱聽人商品」及其當代延伸的說法是兩回事，她明確反對這個概念。看商業電視及從事網路社交傳媒等活動，並沒有辦法使個體通過自己的勞動，將自己製造成為「商品」，致使資本企業得以從中賺取利潤。胡斯認為，這是錯把自由「活動」，當作免費或自由「勞動」，「這是說不通的」，谷歌、臉書等平臺資本集團的獲利，如同熱鬧街道的地主，收的是租金，其用戶如同來來往往的行人，炒高了地租。胡斯進而認為，若將玩家、用戶在網路平臺的消費當作是勞動剝削的來源，¹⁴不僅是認知的失誤，也會弄亂了真正要對抗的處所與對象：由於未能釐清剝削場所，也沒有理順剝削鏈各個單元的關係，將要致使反抗剝削的結盟更為困難，行動會失去著力點。硬要將不是勞動的網路平臺之消費「活動」混雜其中，然後集體命名為「群眾（multitude），生產位置就無從辨認：而只有在這個生產位置，工人才有力量挑戰資本這個結之核心」（同上引，2014, p. 176）。C. Fuchs（傅克斯）在討論數位年代的閱聽人商品（「媒介消費的勞動理論」）時，不以地租說為念，對此，英國

¹⁴ 若僅在網路平臺的消費活動，是一種被剝削的勞動，那麼，以谷歌為例，它在2019年有1610億與340億美元的營業額與利潤，谷歌集團提供眾多產品（超過10億人以使用者有9項），至少40億人使用其中一種（‘Alphabet: Google grows up’, August 1, 2020）。2019年平均一用戶遭剝削8或34美元。

的文化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第一代學者 Garnham（岡恩）也說，「在我看來，這個拒受是大大的錯誤」（Garnham, 2016, p. 298）。

其二，胡斯對「工人生產位置」的認知，以及循此所創造的所有知識及其流通，再至受此指導所確認的對抗核心，其實都涉及了倫理的判斷。否認消費時刻的平臺「活動」是「勞動」，不僅只是認知不同，它還是行動所要奉行的倫理判斷。網路社交平臺固然時而放大「有毒的大眾傳媒」，通過網路平臺而提供勞務、直接為資本勞動的人，如各種快遞員，胡斯認為他們未必是「沒有組織的產業後備軍」，因為其間或有部分兼差的人來自公部門，而 2016 年英國公部門員工有 52.7% 加入工會，其組織經驗有可能移轉進入。放眼世界，2018 年也仍有超過兩億人是工會成員（Huws, 2019, pp. 158-161）。

割捨剩餘價值勞動論，是放棄正統或教條馬克思的歷史命定論，對於委諸最後一刻必然到來的科學觀所蘊含的不（必）行動及不作倫理判斷，是必要的糾正。胡斯很重要的倫理判斷，就在這樣的提問中：

新商品從哪裡來？……為什麼知識經濟或失重經濟與能源和原材料消費的增長有關？……資本主義製造新商品的能力近乎使用魔法，就好像是憑空變出來一樣，與「非物質化」的假設剛好相反……商品的原材料還是來自地球的，唯一的魔法就是人類的發明和勞動（Huws, 2003／任海龍，2011，頁 7，85-86）。

結語：非教條物質論者的認定

物質論者無法否認七情六慾，也能認知主觀效用的感受對於任何人都很重要，它們都在對於價值的選擇及其高低產生影響。然而，物質論

者也同時強調「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是大地提供所有生命的基礎，人力作用其上才能「斯有生」。勞心與勞力的二分、非物質勞動與物質勞動的二分，是誤導的。所有的「非物質」內涵，包括知識與符號及其影音圖文的儲存、傳輸與展示，完全需要人造器物所仰仗的「物質」。

有此領悟，也就知道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沒有重量的經濟、無形資產、非物質經濟或非物質勞動、服務業、智慧財產等等，都不是可以單獨存在的概念。一旦以為後工業、服務業、資訊社會等等之無重量非物質的智慧創生可以獨立存在，並且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更高階段，就有受害於刻板印象或意識形態的危險，甚至正當化了剝削關係的存在，胡斯是這樣說的：

非手工的工作增加很快，但放眼全球，「仍然是佔勞動力的少數……每個人還能用網路的」原因，就在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各大小礦區，及中國的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提供原物料及從衛星到有線線纜等等構成的接收產品與系統；全球一百家最大規模的跨國公司，是有 20 家是非手工雇員為主，但 80 家不是；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資料顯示，2012 年擴張最大的是製造業公司（Huws, 2014, pp. 157-158）。

胡斯並列「物質」與「非物質」，岡恩則直接對比。他說，文化實踐對於現實生活的能耐或意義，不宜誇大，當前的大辯論不在社交傳媒之發展，若看全球經濟，當能看出人們最關注的是：「能源生產，乾淨水源。巨大財富不是高科技或數位元經濟，是在各大礦區……全球經濟的大哉問，是基礎建設這些實體運送問題……」（Garnham & Fuchs, 2014, p. 115）。

《經濟學人》(Economist, 'Always something new', August 19, 2017) 以贊成口吻，引述 Dani Rodrik (羅德里克) 教授的看法：「從十九世紀的英國到二十一世紀的越南，可持續的成長都是以製造業作為基礎」。《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刊登專文，指「資本主義的彌天大謊是：金融及其他資產的市場價值準確反映它們代表的經濟價值」(馬丁·桑德布，2017年8月21日)。《經濟學人》與《金融時報》是英語社會乃至資本主義的喉舌，這些主流刊物並不總是反映真相，卻也會有如實面對世界、意見與胡斯及岡恩相同的時刻。若是有人持續誤把消費活動當成消費工作，忽略網路虛擬空間的存在無法不以物質生產勞動作為基礎，胡斯與岡恩、一刊一報的共識，是恰如其分的當頭棒喝。

參考文獻

- 任海龍譯(2011)。《高科技無產階級的形成：真實世界裡的虛擬工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Huws, U.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李隆生、張又仁譯(2013)。《多少才滿足？決定美好生活的 7 大指標》。臺北：聯經。(原書 Skidelsky, R. & Skidelsky, E. [2012]. *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 New York, NY: Penguin Random House.)
- 沈婉玉(2017年12月22日)。〈彭總裁告別作 為低薪鳴不平〉，《聯合報》，A1版。
- 周憲文譯(1968)。《國富論》。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原書 Smith, A. [1776/1970].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kinner, Ed.). London, UK: Penguin.)
- 周濂(2015)。〈正義第一原則與財產所有權的民主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 66-78。
- 姚建華、徐德驩(2019)。〈勞動的「媒介化」與媒介的「勞動化」：數位勞動研究的內涵、現狀與未來〉，《新聞學研究》，141: 181-214。
- 段忠橋、劉磊譯(2003)。《在自由中喪失一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哲學導論》。北

- 京：經濟科學出版社。（原書 Roemer, J. [1988]. *Free to lose: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馬丁·桑德布（2017年8月21日）。〈從列寧到雷曼兄弟：謊言的代價〉，《FT中文網》。取自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908?full=y>
- 高湘澤譯（2005）。《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Mills, J. [2003]. *A cr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s*.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陳志賢（2017）。〈新盲點辯論與賽伯人商品生產：數位使用者的勞動、剝削與抵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3: 65-129。
- 許國賢（2001）。《財產與政治》。臺北：桂冠。
- 劉道捷譯（2015）。《GDP的多情簡史：GDP到底是什麼？又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每個國家都愛GDP？》。臺北：好優文化。（原書 Coyle, D. [2014]. *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蕭肇君（2015）。〈《數位時代的閱聽人商品》短評〉，《傳播文化與政治》，1: 179-187。
- Alphabet: Google grows up. (2020, August 1). *Economist*, pp. 14-17.
- Always something new. (2017, August 19). *Economist*, p. 62.
- Arrieta-Ibarra, I., Goff, L., Jiménez-Hernández, D., Lanier, J., & Weyl, E. G. (2018). 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r? Moving beyond “Fre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 38-42.
- Bregman, R. (2016). *Utopia for realists: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 Amsterdam, NL: The Correspondent.
- Borowy, I., & Schmelzer, M. (Eds.). (2017). *History of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Historical roots of current debates on sustainable degrowth*. London, UK: Routledge.
- Garnham, N. (2016). Book review: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8(2), 294-300.
- Garnham, N., & Fuchs, C. (2014). Revisi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riple*, 12(1), 102-141.
- Hickel, J. (2020). *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Howard, S. (2020). *The home stretch: Why the gender revolution stalled at the kitchen sink*. London, UK: Atlantic Books.
- Huws, U. (2014). *Labor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The Cybertariat comes of age*.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Huws, U. (2019). *Labour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What next?* London, UK: MacMillan.
- Huws, U. (2020). *Reinventing the welfare state: Digital platforms and public policies*. London, UK: Pluto Press.

- Javadinasab, H., Masoudi Asl, I., Vosoogh-Moghaddam, A., & Najafi, A. (2019). Comparing selected countries using sin tax policy in sustainable health financing: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35(1). Retrieved fro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hpm.2817>
- Meehan, E. R. (2018). A history of commodity audience. In A. Bodroghkozy (Ed.),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broadcasting* (pp. 349-369).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 Savran, S., & Tonak, E. A. (1999).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An attempt at clar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apital & Class*, 23(2), 113-152.
- Shaikh, A., & Tonak, E. A. (1994).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edman, I. (Ed.). (1995.) *Socialism and marginalism in economics 1870-1930*. London, UK: Routledge.
- The data economy: Fuel of the future. (2017, May 6). *Economist*, pp. 14-17.
- Wheeler, K., & Glucksmann, M. (2015). *Household recycling and consumption work: Social and moral economies*.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Weinbaum, B., & Bridges, A. (1976).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ycheck: Monopoly capital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umption, *Monthly Review*, 28(3), 88-103.